

西方學者詮釋中國經典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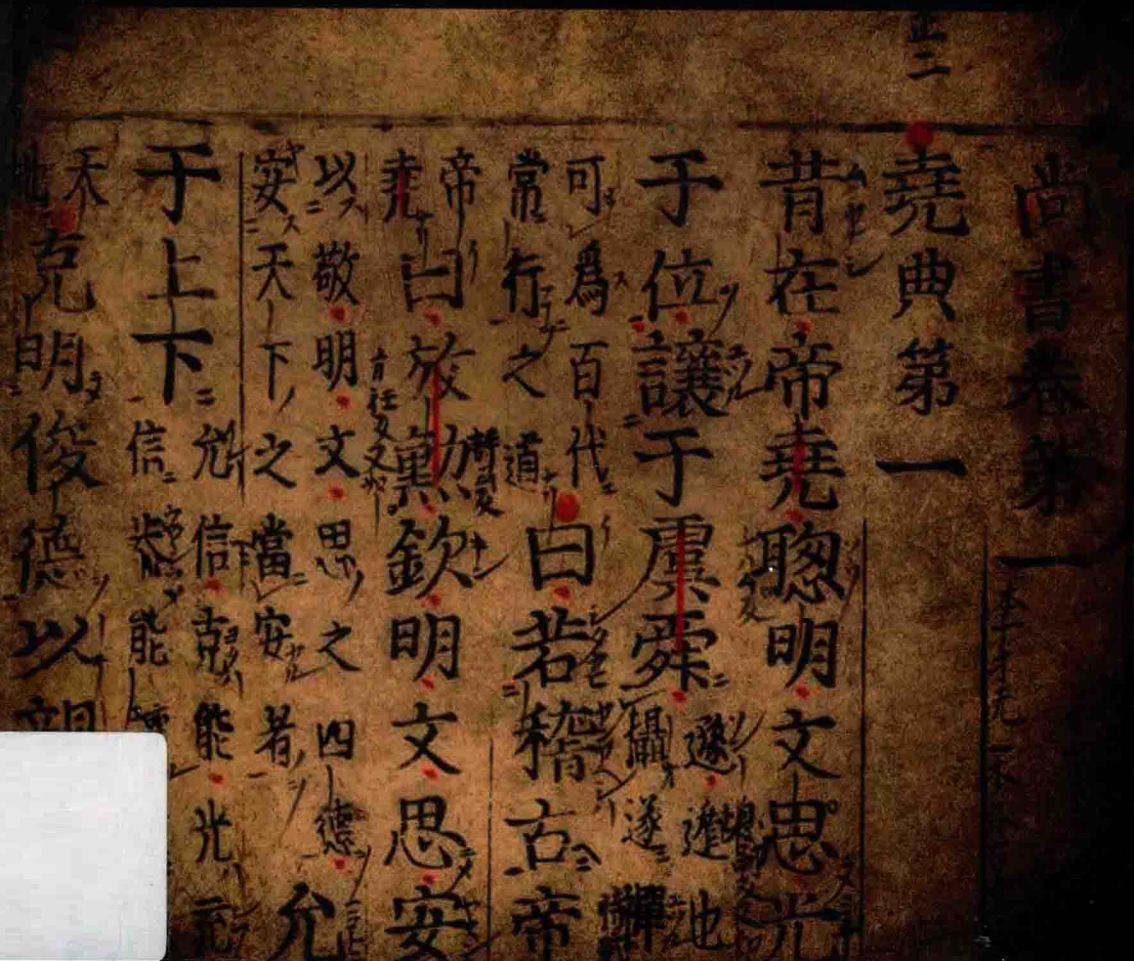
總主編 | 林慶彰、貝克定
主編 | 范麗梅、黃冠雲

孔子之前： 中國經典誕生的研究

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美〕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著
黃聖松、楊濟襄、周博群 等譯
范麗梅、黃冠雲 修訂

二〇〇六～二〇〇八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執行「儒家經典之形成」研究計畫成果



西方學者詮釋中國經典叢書

孔子之前： 中國經典誕生的研究

[美]夏含夷(Edward L. Shughnessy) 著
黃聖松、楊濟襄、周博群 等譯
范麗梅、黃冠雲 修訂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孔子之前：中國經典誕生的研究 / 夏含夷著；黃聖松等譯。

-- 初版. -- 臺北市：萬卷樓，2013.04

面；公分. -- (西方學者詮釋中國經典叢書)

譯自：Before Confucius：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ISBN 978-957-739-800-0(平裝)

1. 古籍 2. 研究考訂 3. 文化史

032

102007161

2013 年 4 月 初版 平裝

孔子之前：中國經典誕生的研究

2013 年 9 月 二刷 平裝

ISBN 978-957-739-800-0

定價：新台幣 300 元

作 者	夏含夷	出 版 者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譯 者	黃聖松	編輯部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9 樓之 4
	楊濟襄	電話	02-23216565
	周博群等	傳真	02-23218698
修 訂	范麗梅	電郵	editor@wanjuan.com.tw
	黃冠雲	發行所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發 行 人	陳滿銘	電話	02-23216565
總 編 輯	陳滿銘	傳真	02-23944113
副總編輯	張晏瑞	印 刷 者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編 輯	吳家嘉		
編 輯	游依玲		
封面設計	斐類設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

網 路 書 店 www.wanjuan.com.tw

請寄回更換

劃撥帳號 15624015

西方學者詮釋中國經典叢書編譯委員會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序)

編譯委員

貝克定 林慶彰 林素芬 胡元玲 張文朝 范麗梅 黃冠雲
黃聖松 陳界華 楊濟襄 楊晉龍 蔡長林 蔣秋華 蕭開元

總主編

林慶彰 貝克定

主編

范麗梅 黃冠雲

西方學者詮釋中國經典叢書 總序一

林序

二〇〇三年中央研究院為提振中國古代史研究，由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和歷史語言研究所等，共同籌劃「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研究計畫。計畫下分為：「經典與文化的形成」、「古代中國及其周邊」兩項先期計畫，進行先期研究及規劃事宜，期望藉此結合國內外相關學科之研究者，共同組成研究群，以新方法、新觀點，用漸進的方式推動中國上古史相關主題之研究及人才之培育，希望在國際學術界中，建立臺灣在此一領域的領銜地位。其中，中國文哲研究所所負責的「經典與文化的形成」研究計畫，在為期兩年半先期規劃計畫的執行期間，大體著力於三大主題：一是經典的形成與流傳，二是經典的詮釋，三是經典反映的文化面向。

先期規劃計畫自二〇〇三年七月一日開始執行，至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束，總共進行了三十場的讀書會和專題演講，部分成果編為《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第一冊（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7年11月）。為了使這個論題能讓學界投以關注的眼光，且能有更多資源用在研究上，我們以「儒家經典之形成」主題研究計畫向法院方提出申請，幸獲通過。自二〇〇六年一月一日起開始執行三年，有十個分支計畫。

本研究計畫的目的不在檢討前賢研究成果之是非，而在結合傳世文獻與新出土文獻來解決以前所忽略的問題，例如：儒家經典的神聖化問題，並沒有典籍有明確的紀載，那麼神聖化起源於何時，就有深入追究的必要。本研究計畫的目的就是要在當代的學術氛圍中，利

用現存的文獻或新出土的文獻，來彌補以前關照面的不足。

在執行計畫的過程中，我們發覺國外研究此一論題的單篇論文和專著，也有不少。我們邀請國內精通外文的學者翻譯相關的論文多篇，一部分成果已刊登在《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第一、二冊「翻譯篇」中。另外有不少新出版的專著，專門詮釋中國的經典，我們也希望陸續翻譯成中文，匯集成一套叢書，供國人參考之用。以前西方學者討論中國傳統學術的著作，大多屬於歷史、哲學方面，討論經學的著作為數雖不多，但仍有可參考者，可惜很少學者加以介紹，或者翻譯成中文，國內學者也就較難藉由這些著作來學得較新的研究方法和增進自己相關的知識。為了讓國內學者能夠很快地了解國外研究中國經學的現況，我們邀請來自哈佛大學的貝克定（Timothy Baker Jr.）博士一起來規劃一套西方學者詮釋中國經典的叢書。我們蒐集了數十種書。經過半年的挑選，選入這套叢書的有以下十種：

1. Edward L. Shaughnessy

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2. John B. Henderson

Scripture, Canon, and Commentary: 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

3. Kidder Smith, Jr., Peter K. Bol, Joseph A. Adler, and Don J. Wyatt

Sung Dynasty Uses of the I Ching

4. Tze-ki Hon

The Yijing and Chinese Politics : Classical Commentary and Literary Activ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960-1127

5. Steven Van Zoeren

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

6. Tomas W. Selover

Hsieh Liang-Tso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 Humane Learning as A Religious Quest

7. John Makeham

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8. Daniel K. Gardner

Zhu Xi's Reading of the Analects : Canon, Commentar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9. Daniel K. Gardner

Chu Hsi and the Ta-hsueh : Neo-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he Confucian Canon

10. Bryan W. Van Norden

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 New Essays

這十本著作皆由貝克先生來跟作者或出版者連絡，他們對我們傳揚學術的用心，都很欽佩。從今年起我們將陸續出版這十本著作。至於這十本著作的內涵和他的重要性，貝克先生的〈序〉已有詳細的說明，各位可以參看。

我一向扮演學界拓荒者的角色，一九七五年，我開始研究明代考據學，有人說明代沒什麼好研究的，勸我放棄這個念頭。我為了堅持理想，無視眾人異樣的眼光，勇往直前，完成了《明代考據學研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一書，這書奠定了研究明代學術史的基礎，到現在已經成為研究明代學術思想史必讀的參考用書。一九八七年，我開始編輯《經學研究論著目錄》（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1989年），創新了不少專科目錄的體例，到現在這本《目錄》已成為國內外編輯專科目錄的典範，許多國內外出版的專科目

錄，或多或少都受到這本《目錄》的影響。一九九一年，我開始編輯《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3年10月），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本日本研究經學的目錄。一九九七年，我到日本九州大學訪問研究一年，編輯《日本儒學研究書目》（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7月），這是第一本日本研究儒學的書目。這兩本書目奠定了國人研究日本漢學的基礎，可以說是國內研究日本漢學的分水嶺。二〇〇〇年，我出版《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彌補了日據時期臺灣儒學文獻的缺漏，現已成為研究日據時期臺灣儒學和經學最重要的參考用書。二〇〇五年起，我開始執行「民國以來的經學研究」計畫，發現北京圖書館所編的《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市：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收錄民國時期經學著作僅有兩百二十種，為了解決問題，我編輯《民國時期經學圖書總目》（稿本，待刊），已收錄經學書目一千四百種，這是一個驚人的數目。僅有書目對研究的幫助仍舊相當有限，於是我編輯《民國時期經學叢書》（臺中市：文听閣圖書公司，2010年），已出版一至六輯，合計七百多種。這個事實可以證明，民國時期經學研究雖非學界主流，但並沒有真正的衰落。

國內中文學界一直對國外研究中國經典了解不足，所以也無法引用西方的長處來彌補自己的缺點，我們竭盡心力規劃了一套可以幫助國人了解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經典的叢書。二〇〇六年開始，我和貝克先生開始籌畫，我們知道要把這些零散的西方學者著作蒐集起來，編輯成一套叢書，需經過很多困難。首先要跟作者和出版者聯絡，徵求他們的同意，再找翻譯者。大家都知道經典的研究本來就很困難，要能了解經典的內涵，對經典有相當程度的熟悉，才能作翻譯的工作，這樣的人才在國內相當不容易找，也因此我們在找人翻譯的過程中遭遇了很多困難。但是，我們一想到這套叢書可以對國內中文學界

有所幫助，我們不畏艱難，勇往直前，這也是一件開拓性的工作。做了這麼多拓荒的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幫助國內學術界奠定研究的基礎，然後了解西方研究漢學的虛實，不要在全世界漢學研究的競爭中，被邊緣化，這是我從事學術研究三十多年來一貫努力追求的大目標。

林序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誌於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501研究室

西方學者詮釋中國經典叢書 總序二

貝克序

本譯著叢書集結近二十年西方研究中國儒家經典的重要英文學術著作，而這些學術著作的作者也都是近年西方研究中國儒家經典具有卓越成績的學者。除了本叢書所收錄的學術著作之外，西方尚有許多研究中國儒家經典的學者，其著作對中國儒家經典的研究亦具有重要性的貢獻，然本叢書實難將這些著作悉數譯出，請讀者諒察。本叢書集結的這些著作，其作者並非全都生於西方，而且在這些作者中，有許多人絕大部分的學業是在臺灣或中國大陸完成的，因此他們對中國經典傳統相當熟悉。但儘管如此，他們也承襲歐美過去三個世紀以來對中國儒家經典研究的傳統。

歐洲對中國儒家經典的研究，原先是居於歐洲中國文化研究的核心地位，而且在研究中國儒家經典的頭幾個世紀，是為了要理解中國學術的價值所在。這些西方早期的學者認為經書應該是中國思想的根基，同時也是理解不同思想的關鍵，如同古希臘羅馬的經典也應該是西方思想的根基一般。這樣的看法在方法上或程度上是否正確，並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議題，但經書的確是西方思想家試圖了解中國人如何理解世界的開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對亞洲語言和文化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轉折，中國儒家經典的研究也隨之發生了大幅的改變，這是由於中國經典的研究在亞洲語言和文化的研究中失去了核心的地位，而且在學術的研究方法上也有所轉變。在所有與亞洲研究相關的學術領域中，包括中國經典的研究，最重要的改變之一即是西方學者和亞洲

學者雙方良性的互動，使得彼此能更深刻的瞭解對方的研究成果。儘管現今西方對中國的學術研究，其成果與現今的中文研究成果相較，兩者之間的距離已比五十年前更加拉近，但仍有某些方面的特點與臺灣和中國大陸的主流研究有所不同，而這些特點也都表現在本叢書的許多著作中。

首先，在這些著作中，有關社會、學術或文化的環境背景是最被關注的重點，而經書文本的原始意義大致上是次要的。這些著作是以雙向論證的分析方法（two-way dialectic of analysis）進行研究，也就是以環境背景來說明歷史上某位具有重要地位的學者為何會特別地在這個時期如此地解釋文本，而此學者解釋文本的方式又被用來闡述當時文化上的各種環境背景。其中社會和文化的議題可從許多觀點切入，如學術自由與國家高壓政策兩者之間的討論，因為這兩者都曾在中國經典的研究上發生過重大的影響。然而，有關這些文本的環境背景論點（contextualism），其價值觀不可用之太過。儘管我們可以將理解中國經典的焦點放在對環境背景的瞭解上，並以此作為理解中國經典最主要的方法，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些關於環境背景的論點，並非總能完全清楚明確且牢不可破地去解決這些文本中的疑義。因此，就此情形而言，利用文本批評的方式可將讀者原先專注的焦點重新轉向，並使讀者在文本理解上能求得其他的可能性。

在歷史的環境背景中去尋求文本的真義，可以確知文本最底層的真義是無法求得的，所求得的是受到歷史影響的意義，至少從現在這些作者的觀點來看是如此。這樣的結果何以會出現，則是需要我們去證明的。至於這些受到歷史影響的意義是否就是文本真正根本意義的反映或是不完整的理解，又或者這根本意義是我們可藉由不同版本之間的探討而得，則是每位讀者必須自己去尋求解答的問題。

第二，關於類型（genre），即中國經書的注釋類型與經書本身

的類型。這些類型的分類體系（typologies）在歷史上如何作用，且在歷史上如何被定義，以及此領域的學者如何從當下的時代跟文化來了解這些分類體系，則是我們要關注的。中國在文本的注釋類型上，有著行間夾注（interlinear textual commentary）的傳統，儘管這個注釋的類型並不只用於經書，但仍與其他文本有很大的關聯，因此我們很難只研究某書而忽略他書。雖然這些學者對經書中原始的意義興趣不高，將之置於次要的位置，但他們仍從文本的原始用字（original words），各種不同類型的注釋，注釋者思想上的關注、假設（intellectual concerns and assumptions）、所處的時代三個方向進行交互討論。

本叢書所收錄的這些著作還有另一個共同的傾向，即這些學者或多或少想要將經書與給予其生命與發展的母體（matrix，即儒學的信念和道德實踐）分開，這反而使得在定義儒學思想學派時，大多是以經書的研究來定義。因此，本叢書的這些譯著很自然地將經書置於撰作和解釋經書的時代思想背景中去研究，也就是說，這個背景雖然以儒學為主，但文本皆是各自獨立運作的。

在某些作者的其他著作中，特別是韓德森（John B. Henderson, 1948-）及韓子奇（Tze-Ki Hon, 1958-），皆曾強調經書與正統儒家傳統本身定義（self-definition）的關係。然而，在本叢書的著作中，作者們認為個別的經書或經典本身的主要部分為一思想文化的存在實體（entity），是直接屬於廣大社會和政治環境背景（milieus）的一部分，而他們這樣的想法比起將之認為是屬於儒學的，可能更加合適且有所超越。

經書存在於儒學的背景下已有兩千多年之久。也就是說，兩千多年來讀經、注經及釋經、以及經書的教授在不同階段的教育中，這整個的過程幾乎是以經書是儒家思想基幹（backbone）的含義來進行

的，而這裡的儒家思想在意義上可理解為一種態度或一種共有的價值觀或目標，而不只是信仰、文本或禮節儀式這種核心的定義。自中國傳統君主專制政體滅亡後，社會上和思想上產生了急遽的轉變，儒學的社會和政治地位也產生了極大的變遷與不明確的情形。雖然治世的目標在國家、家庭、個人的層面上依然強烈，但已很少人會依儒學所標的綱目去追求，而這時移世變的觀點也不能不對中國本土的經學研究造成普遍的影響。相反地，西方對儒家經典的討論，除了幾個學者的論點之外，通常能不為儒學所遮蔽而進行。

最後一點是，相較於中國學術界研究經典的主流，本叢書所收錄的這些著作對與經書相關的二次文獻（secondary literature）則並無太多的討論參與其中。雖然有時候對二次文獻的討論確實是有出現的，但在作者主要的論述中通常是次要的。這些研究真正著重的反而是經書中潛藏的、未明言的內在意義，而這也與現代西方思潮關注的議題緊密相關。這些議題與英美在史學理論的論述上有更多的相關性，而與法國或德國在這些議題的論述發展上不大相關。在這些論述中，有三方面的議題值得關注，即決定論（determinism），單元觀念（unit ideas）與傳承（transmission）。

決定論這個議題指的是我們是否可以瞭解文本的內容是什麼，以及我們何以可以確定我們對文本的內容是瞭解的。文本是否有意地留有繼續討論的空間（open-ended），又或者這樣的討論空間會出現有一部分是因為作者本身無法確定自己的意義是否正確，而有一部分是因為讀者無法穿透文化及語言變遷的厚重面紗而獲得文本最後的真義呢？另一個與決定論意義不同的議題，也就是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也在二十世紀初由物理學家們所提出，而自這個議題提出後，也對同時期的當代西方文學及文學批評造成影響。決定論是二十世紀初實用主義（pragmatist）思想學派所關注的核心議題，

特別是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他主張真理（truth）和觀念（idea）兩者之間若缺乏一種穩定的關係，那麼觀念便會藉由發生在真理和觀念的事件過程中變成真理。本叢書這些著作中的基本理解背後，也含有此一態度。

相對於不確定性的流動性、可變移性（the fluidity of indeterminacy），也就是單元觀念的概念，儘管這個概念在主要倡議者羅孚若（Arthur O. Lovejoy）提出後，便在提出的方法上受到嚴厲的批評，但這個概念普遍影響了學者們的思想史觀。雖然批評羅孚若的人否認這些單元觀念是可隨著時間流逝而持續存在並發展演化的實體，但在中國經典的背景下，使我們很難不去聯想到發揮在中國經典結構研究（structure study）上的基本概念，與單元觀念有著極為相似之處。在本叢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學者從這個論辯的背景展開研究，並以這些概念中更精微的觀點作了明確的定義。

「傳承」這個議題可視為前兩個議題的延伸。傳承指的是在學者之間如何建立共享的觀念（ideas）和實體文本（physical texts）。被經典化後的文本在還未形成文本之前，是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承。我們若要對這段口耳相傳的時期有所瞭解，可從帕里（Milman Parry, 1902-1935）與洛德（Albert Lord, 1912-1991）二人早期對西方荷馬經典作品的研究中去追溯，而他二人的研究，也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中國經典初期形成的問題。後代學者在研究上所關注的議題，則多來自於以下兩方面：一是要瞭解記載與複製文本的方法對文本理解的重大影響性，另一是要瞭解文本如何對其所關注的時代社會具有影響力。

其中還有一個議題要討論的，就是這些作者如何選擇想要研究的經書。如同宋代偏重《四書》的研究，西方在研究中國經書時似乎也著重在較為平易近人的文本上，也就是《易》、《詩》和《論語》，特別是從上個世紀的中葉開始。至於《尚書》、《禮記》、《春秋》這

三部經書，西方則鮮少注意。這或許有部分的原因是此研究領域中以英語從事研究的學者，他們在閱讀中國經書時的需求與本身的才能，因為他們最感興趣的中國經書，是那些恰巧可符合現代世界某些情形的價值觀並以之作為評價的經書。而《尚書》、《禮記》、《春秋》這三部中國早期的經書之所以未能成為近期西方研究的主流，可能與其文字和語言研究上的不易有關。

除了選擇想要研究的經書之外，還有一個議題是西方的學者在過去五十年是如何研讀這些經書。過去五十年西方學者研讀經書的方法是與宋學派學者相近的，正如賈德納（Daniel K. Gardner, 1950-）所說的「以當代的語言去『重新閱讀』文本」，而非漢學派的釋經方式。雖然此二學派（若漢學、宋學真正可被認為是學派的話）的對立立場，已於過去幾十年中大大地和緩下來，但此二學派仍持續保有其某些特定研究方面的特徵記號可供區分。然而，西方對中國經書的研究並沒有朝向中國那樣的劃分方式發展，也就是說，在西方雖然經書本身仍各保有其相當清楚明確的定義，但經學本身是否以學科的方式存在則很難說。

最後還有一點，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些作者與中文著作的作者有許多不同之處，是因為兩者各有各的讀者，而且兩方讀者的設想與興趣也不盡相同。西方的讀者大致上多喜好在中國經書研究之外，繼續與思想史相關的議題；相反地，中國的讀者則想要對經書相關的議題更加專精且瞭解。因此這些作者在著作中一方面呈現自己對文本意義的理解，另一方面則論證這些文本在意義上有其流動性。

最後我想以一句英文的諺語作為總結，這句諺語是「將煤礦運往新堡市（Carrying coals to Newcastle）」，意即多此一舉、徒勞無功，因為新堡市是英國歷史上煤礦輸出的主要海港之一。但這句諺語在美國有著第二層含義或反響（resonance），這是因為美國早期一

位來自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商人戴思特（Timothy Dexter, 1748-1806），於十八世紀末真的將煤礦裝船運往新堡市，並藉此發了一筆小財，因為這批煤礦在運抵新堡市的時候，正巧遇上煤礦工人罷工事件，也因此煤礦的需求量激增。

我懷著謙卑之心以此英文諺語作為本西方學者詮釋中國經典叢書總序的總結，是因為這個研究主題在中文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經相當豐碩；我也希望能從這些英文研究著作中，發掘出某些具有價值的觀點，並將這些觀點運回此研究領域的發源地。雖然研究經學的學者在從事研究工作時，幾乎不會停止或怠惰，但本譯著叢書在某些方面與他們致力研究的方向上既有相似又有不同，這或許可引發他們對本譯著叢書的興趣。讀者在閱讀本譯著叢書時，或許會發現有某些觀念是他們過去所熟悉的，而有的則是具有新穎性和挑戰性的觀念。在過去的幾十年間，華人學者與西方學者在中國學術研究的成果上，兩者之間的差距已明顯地拉近；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經學文獻組出版本譯著叢書的目的，也在於進一步地使東西方學者一同為中國經學的研究而努力。



貝克定

2010年11月序於

臺灣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

《孔子之前》中譯本序

夏序

《孔子之前》這個小集子是上個世紀九〇年代中收集的（1997年出版），所收八篇文章都是此前撰作的，甚至有幾篇是十幾年前我還在學生時代寫的。現在校對幾十年前所做的文章的中文翻譯，一方面我對內容都很熟悉，但是從另外一方面卻感到相當矛盾，有一點覺得自己並不認識作者。這當然是因為時間一直在改變，像孟子說的那樣「彼一時，此一時也」，我自己的研究興趣也一直在改變，現在的「我」已經不是二十年前的我。不僅僅我是這樣，人人皆如此。然而，還有一個原因是這些中文譯文好像不是我自己寫的：這些文章原來是為了西方讀者用英文寫的，中文譯文儘管翻譯得很好，但是畢竟是譯文，不是原文。這不純粹是語言問題，而更重要的是怎樣表達學問的問題。我自己經常用中文撰作學術文章（甚至，現在幾乎只用中文撰寫學術文章），我知道得很清楚，西方讀者和中國讀者有不同的基本知識、不同的閱讀習慣、不同的分析方法和不同的論證方法。《孔子之前》所收集的文章原來都是針對屬於西方學術環境的讀者而寫的。儘管中文譯文的語言都很通順，但是不知道文章的學術概念能不能同樣清楚的表達出來。翻譯者都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希望中國讀者可以略窺其概要。

於此順便說一下翻譯的過程。很多年以來，每次訪問臺灣的時候，都受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教授林慶彰先生非常友好的招待，經常邀請我在文哲所作學術報告。從大概是二〇〇七年開始，林教授配合他主持的「儒家經典之形成」研究計畫，要讓中國讀者多知